

21 世纪以来美国对越政策叙事的演进逻辑 ——话语谱系学的视角

岳圣淞

【摘要】 美越关系的持续升级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美国决策方观念的变化是推动美国对越政策演进的重要因素，其行为逻辑通过政策叙事话语得以充分体现。本文借鉴话语谱系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勾勒出美国对越政策演进的“话语图谱”，为美越关系升级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分析发现，自 21 世纪以来，基于两国发展的现实需求，美国的官方话语不断试图扩充对越南身份认知的新内涵。并且，随着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外战略趋向的调整，美国在对越政策叙事总体架构、议题和内容选择、话语量级与频率、话语风格及策略等方面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表达，确保自身的战略意图和决策意志始终得到及时呈现。相较于既往以理性主义范式和物质主义视角为基础的研究，从决策方的主观视角出发、以政策话语分析为路径检视美越关系的演进过程，或可为加深对美越关系发展动因和演进规律的认识提供一种启发性视角。

【关键词】 美国对越政策；美越关系；话语谱系学；战略叙事；对外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D837.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 (2024) 04-0001-21

一 问题的提出

越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之一，中越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两国在地缘、安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利益深度交融，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方面高度趋同^①。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转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持续深化，美国深入推进“印太战略”，不断加大对越南的拉拢力

【作者简介】 岳圣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潘金娥《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实践动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7 期。

度，企图将越南拉入“遏华包围圈”^①。而基于对自身所处外部环境的评估，以及推行“大国平衡外交”以提升自身区域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考量，越南也对美方的战略意图予以回应，促使美越关系持续升温。2023年9月，在拜登首访越南之际，美越两国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提升至越南对外关系体系中的最高层级^②。

美越关系的持续升级引发了地区相关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界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通过对21世纪以来美越关系演进过程的考察发现，尽管两国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但依旧实现了较快发展，各层次互动日益活跃，合作领域不断扩大^③。值得关注的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存在根本性差异，历史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和对抗虽然在战后有所消减，但并未消失；而且，美越和解进程并未因此而经历根本性转折。作为双边关系中具有明显战略优势的一方，自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历经五任更迭、对外战略多轮调整，但其对越政策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连贯性和积极势头——这一现象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兴趣^④。但回顾文献发现，基于主流范式下的相关研究多存在对政策过程的分析解释变量单一、以片段而非连贯的视角、重视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等不足，且普遍呈现出重“物质”轻“观念”因素、重“客观”轻“主观”因素的特点。事实上，美国决策方的观念变化是导致美国对越政策演进的重要动因，其行为逻辑通过政策叙事话语得以充分体现，但学界并未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在面临诸多复杂挑战的背景下，美越关系为何仍能快速升级？从美国决策者的视角看，美越关系不断改善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何通过政策叙事得以建立和维系？推动美越关系升级，是美方为实现对华制衡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还是对越“化敌为友”战略谋划的延续？本文通过借鉴话语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对越政策叙事的建构过程展开全时段（1995年至今）分析，为美国对越政策演进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① 余浩铭、吴昊 《推进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探析》，《东南亚纵横》2022年第6期。

② 截至2024年3月，越南已同七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别为中国（2008年5月）、俄罗斯（2012年7月）、印度（2016年9月）、韩国（2022年12月）、美国（2023年9月）、日本（2023年11月）、澳大利亚（2024年3月）。有关中越和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对比，参见Khang X. Vu “External Coercion, Internal Accommodation: China’s Wedge Strategies Towards the Vietna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2013–2022”,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2, 2023, pp. 1–21.

③ 覃丽芳、赖洁林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越南经贸关系表现及分析》，《东南亚纵横》2021年第4期。

④ 有关美越和解的研究，代表性文献参见Ted Osius, *Nothing Is Impossible: America’s Reconciliation with Vietna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21; Simon Desplanque “Tokens for Reconciliation?: The Place and Role of Veterans in the Vietnam War Documentary Series”,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8, No. 1, 2021, pp. 3–21; Justin Ahn, “Reconciling with a Former Enemy: Post-War Diplomacy Between the US and Vietnam”, *American Diplomacy*, November 2023, pp. 1–5; Matthew Fehrs “Letting Bygones Be Bygones: Rapprochement in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2, 2016, pp. 128–148.

二 话语谱系学：主流范式认知与区域国别 视角之外的研究议程拓展

对交战国战后和解进程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通过对交战双方战后和解动因、方式及政策影响的系统性剖析，国际关系学得以不断加深对战争根源的认知，分析战后和解与重建互信的必要条件，探索国家间以非战争方式解决争端的可行性路径，为推动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贡献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①。学界普遍认为，相较于德法、德波、中日、日韩等战后双边和解案例，美越战后关系的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解进程更为复杂^②。始于 20 世纪下半叶、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越南战争无论是从战争原因、规模、形式、波及范围以及影响周期看，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③。美越之间的真正和解，不仅需要摒弃战争记忆给双方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创伤，还需克服难以逾越的“价值观鸿沟”和“身份认同危机”^④。更重要的是，在双方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长期明显不对等的状态下，如何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政策叙事构建双边关系改善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基础，为推动双边关系的最终和解规划长期的政策实践路径，为重建战略互信奠定物质和制度基础，都将给双方的战略决策带来重大考验^⑤。

（一）主流范式认知

在主流范式的研究中，现实主义倾向于将美越关系改善的根本动因归结为区域权力格局演变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⑥。安德鲁·普莱斯特指出，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迅速确立了区域领导地位，但其影响力并未及时触达亚太国家的每个角落，特别是对曾属苏联势力范围内部分国家的掌控未及预期，越南恰处其中的关键地带。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东南亚国家区域意识的普遍觉醒，亚太地区的权力多极化趋势开始逐步显现。这让美国意识到，必须积极改善同域内主要国家的关系，方能以较小代价实现权力集中和区域治理责任的分担^⑦。基于此，美国通过持续升级的物质援助与经济合作，助推越南实力增长，双边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实质性改善。在现实主义看来，美越关系的提升始终都具有鲜明

① 乔格·卢尔著，戴启秀译《战后和解——以德法、德波关系中德波关系为例》，《德国研究》2006 年第 3 期；王高阳《战后韩日和解的历史与现实——兼与中日和解的比较》，《东疆学刊》2018 年第 4 期；和春红《战后东南亚地区和解——兼论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和解中的作用》，《长江学刊》2019 年第 5 期。

② He Yinan “Comparing Post-War (West) German-Polish and Sino-Japanese Reconciliation: A Bridge Too Far?”,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7, 2011, pp. 1157-1194.

③ 庞少哲《近 20 年来美越战争史研究述评（2001—2020）》，《社会科学动态》2021 年第 12 期。

④ Catherine Lu “Shame, Guilt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War: Post-Traumatic Societies: On Reconciliation, Justice and the Emo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1, No. 3, 2008, pp. 367-383.

⑤ Khuat Quang Long（屈光隆：《建交后越美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27-39 页；刘卿《美越关系新发展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⑥ Kenneth Payne “Fighting On: Emotion and Conflict Terminat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3, 2015, pp. 492-497.

⑦ Andrew Priest “From Saigon to Baghdad: The Vietnam Syndrome, the Iraq Wa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lligence & 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2009, pp. 139-144.

的“物质驱动”和“需求驱动”导向。但同时，两国关系的改善效率虽超出预期，却仍难以建立高层次的战略互信^①。

制度主义认为，战后美越关系的改善是两国在区域制度框架下持续互动的结果，但美方在此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越战结束后，美国持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战略投入^②，除了提升同域内传统盟国间的协作水平外，还加强了对新兴国家的扶持与合作力度。由于美国在安全、经贸和外交等领域延续对越制裁，越南成为美国主导的亚太制度体系的“例外国家”，继续游离于地区议程之外^③。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指出，将“最大限度团结太平洋地区国家，共同应对未来的多重风险与挑战”作为美国区域治理的“最优先要务”，并强调要“提升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推动在通行的国际规则框架下解决区域争端”^④。在此背景下，越南不再被美国视为掣肘其整合亚太地区合作资源的障碍，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⑤。布兰德利·沃马克在以越南为案例讨论国际制度对国际体系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制度约束在战后越南重塑国际形象、改善同中美等大国间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⑥。在实力地位处于明显“非对称”条件下的双边关系中，制度可以发挥平衡预期、规范利益交换行为的功能。21世纪初越南经济的亮眼表现，及美越经贸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也证明了这一点^⑦。

相比之下，后实证主义对美越关系的研究更关注非物质性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建构主义认为，战略文化是影响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基础性要素^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文化经历了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冷战结束后，又逐步走向康德文化^⑨。美越关系的改善，正是这种战略文化转向背景下出现的必然现象。在此基础上，秉持后实证主义身份政治视角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国家间关系发展走向的多元化趋势，是相关国家认知差异和自主选择的结果^⑩。在美越关系中，身份建构与互动进程很大程度上对双边关系的界定产生了影响，并

① Phan Xuan Dung “‘No One Can Force Vietnam to Choose Sides’: Vietnam As a Self-Reliant Middle Power”, *Asia Policy*, Vol. 17, No. 4, 2022, pp. 155-177.

② Mark Lacy, “Intellectual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nstant Emergenc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2, No. 9, 2011, pp. 1673-1690.

③ Ken Cunningham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Rationality’ of US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War in Vietnam”,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No. 4, 2002, pp. 509-523.

④ See Brian J. Snee, “Clinton and Vietnam: A Case for Amnestic Rhetoric”,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49, No. 2, 2001, pp. 189-202.

⑤ 信强 《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

⑥ 布兰德利·沃马克著，温卫杰、万鹏译《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1期。

⑦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ymmetry, Leadership and Normalcy”, *Pacific Affairs*, Vol. 76, No. 4, 2003, pp. 529-548.

⑧ 方长平 《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论坛》2004年第3期。

⑨ 李晓燕 《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

⑩ Khang X. Vu “External Coercion, Internal Accommodation: China’s Wedge Strategies towards the Vietna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2013-2022”,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2, 2023, pp. 19-20.

最终改变了双边互动和交往的基本模式^①。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及其阵营内国家集体身份的消亡，导致美国的对抗性身份随之丧失了合法性基础。新的区域领导者身份促使美国开始主动塑造自身作为“亚太国家”成员的新集体身份，并试图通过与域内国家的积极互动加强共有身份的认同基础。在此背景下，越南不再被强行建构为美国认知体系中的“他者”，而被赋予了一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成员身份标识^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美越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和解以身份和解为前提，双方交往互动的不断扩展和关系的升级也得益于身份和解带来的相应威胁感知的下降。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现实，美越关系加速升级，身份理论将这一趋向解释为中国区域身份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地区原有的身份秩序等级，中美围绕“地区领导者”身份的竞争改变了双方及其同域内其他国家间的互动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③。为实现霸权护持，美国决意同步提升其与域内主要国家间的关系水平，旨在维护身份等级的平衡，为延续自身作为“区域领导者”的核心身份提供合法性依据^④。

（二）区域国别视角下美越关系：议程进展及评价

客观来说，学界对美越关系的研究始终存在多重视角。这一方面是由美越两国国情、政策趋向及双边关系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越关系的发展为不同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全面考察国际权力格局变迁对区域性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国家间战略博弈行为规律的典型案例^⑤。因此，对美越关系研究的回溯不应只关注范式差异，还应将区域国别的视角纳入其中，以为深入理解美越关系的演进动因提供一个更为具象化的实践场景和政策语境。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区域国别的视角下，对美越关系展开学理性认知的分析至少应包含美国、中国和东南亚三个主要角度。

美国对越南及美越关系的认知深受历史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倾向。由于“越战综合征”（Viet Nam War Syndrome）认知定势的裹挟，美国政、军、学界对美越关系的评价始终未能摆脱“敌—我”的二元对立框架，对美越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分析均展现出浓厚的冷战思维色彩^⑥。

在美越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主倾向于在越战及东南亚冷战的

① Leif-Eric Easley, “Middle Power National Identity?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in US-China Geopolitics,” *Pacific Focus*, Vol. 27, No. 3, 2012, pp. 439-440.

② 李忠林 《越战后美越关系的发展——一种建构主义视角》，《红河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③ Raymond F. Burghardt,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Old Enemies Become Fri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Vol. 32, No. 1, 2012, pp. 152-154.

④ Bich Tran “Vietnam’s Strategic Adjustments and US Policy”, *Survival*, Vol. 64, No. 6, 2022, pp. 77-90.

⑤ Brian Cuddy and Victor Kattan, *Making Endless War: The Vietnam and Arab-Israeli Conflic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3, pp. 22-39.

⑥ Anon, “Timeline: US-Vietnam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2, No. 3, 2012, pp. 350-353; 王立新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

史学框架下对美越关系展开分析,并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因素^①;美越建交后,美国学界的研究开始逐渐转向,从东南亚地区战略的角度分析美越合作的可能性及前景,研究议程主要聚焦经贸、安全和人文领域^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逐渐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美国学界对美越关系的研究偏好也随之展开调整,开始关注美越关系的战略价值,并继续围绕两国经贸、安全、历史、意识形态等相关问题展开具有鲜明政策导向性的研究^③。

中国学界对美越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一系列研究视角和议程的调整。在美越关系正常化以前,国内学界对美越关系的关注曾长期局限于冷战史学的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对立色彩,并不过多探讨美越关系本质及其地区影响^④。1995年美越建交以来,国内的相关研究曾出现两波短暂的“小高潮”,分别就美越关系正常化的动因及影响展开讨论^⑤,以及在2013年美越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讨论越南对外政策的演进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⑥。此后,对美越关系的研究进入常态化周期,聚焦经贸、安全等问题的专项研究占据主导。直至特朗普政府宣布推进“印太战略”以来,美越关系再次成为国内区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趋势延续至今^⑦。

囿于研究资源和水平的限制,东南亚学界对美越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系统性不强。随着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东南亚国家开始逐渐意识到越南在区域整体发展中影响力提升的现实,并开始关注越南对外政策的动向^⑧。但总体来看,相较于美国和中国学界,东南亚国家对美越关系的关注很大程度聚焦于更为具体的议题,如美越关系发展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越关系发展对越南在地区多边机制框架(如东盟、澜湄合作机制等)中角色、地位和功能的影响等^⑨。

总体来看,既往研究在范式、视角和议程方面日渐丰富和具体,但普遍存在解

① Bhakti Putra Utama et al., “Towards Perpetual Peace: The Dynamics of US and Vietnam Relations Since the Settlement of Agent Orange Case 2000”, *Global: Jurnal Politik Internasional*, Vol. 21, No. 2, 2019, pp. 198–218; 王立新《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内容与作用》,《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

② Sarah E. Wagner, “A Curious Trade: The Recovery and Repatriation of U. S. Missing in Action from the Vietnam Wa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7, No. 1, 2015, pp. 161–190.

③ Nguyen Thi Kim Ngan, “Metaphysical Experience in Postwar Vietnam”, *Narrative Culture*, Vol. 8, No. 2, 2021, pp. 297–316.

④ 郑翠英《试论冷战后越南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⑥ 方天建、何跃《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大国战略调整述评》,《世界地理研究》2013年第3期。

⑦ 韩志立《关系网络的竞争“印太”战略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挑战——以关系主义身份理论为视角》,《外交评论》2019年第2期;刘琳《东盟“印太展望”及其对美日等国“印太战略”的消解》,《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岳圣淞《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⑧ Fransiskus Xaverius Lara Ab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n the ASEAN-Indonesia, Vietnam, and Cambodia: The Effects of a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A”, *Basel: MDPI Economics*, Vol. 9, No. 4, 2021, pp. 1–21.

⑨ 王国平、李见明《越南:新兴的东盟中坚力量》,《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11期。

释变量单一、重视共时性而非历时性分析等不足；在解释美越关系演进动因的过程中，普遍呈现出重“物质”轻“观念”因素、重“客观”轻“主观”因素的特点。本文认为，政策话语最能完整连贯地反映决策者的观念变迁和决策逻辑，从决策者主观角度出发，模拟其认知决策思维路径对政策话语展开分析，将令研究者得以以最集约、最准确的方式对决策行为进行复盘，以揭示政策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互动的逻辑线索^①。

（三）话语谱系学与对外政策叙事分析

国际关系研究中话语谱系学（discursive genealogy）方法是近年来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逐渐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分析模式。话语谱系学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法国哲学家福柯所提出的“谱系学研究方法”以及“话语权力论”^②。在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研究视域的过程中，其又吸收了批评性话语分析（CDA）、政治话语分析（PDA）以及政策叙事学研究的观点，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相较于既往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路径，话语谱系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三点，这也构成了其分析方法的核心架构：第一，在宏观上，强调政策话语的“代际传播”属性及其实践逻辑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在话语谱系学视角下，政策文本犹如一张反映特定政策从酝酿、提出、实践到完善全过程的“图谱”，它不仅包含严格的时间线流程和明确的政策要素，还遵循着既定的实践规则^③。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任何特定领域对外政策的实践逻辑都是连贯且完整的，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推倒重建”或“另起炉灶”^④；尽管不同阶段的政策制定和实践主体会发生变化，但为了维护政策逻辑自治，其对政策的调整始终是在不同领域的政策要素之间寻求平衡和妥协，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政策之间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代际传播”^⑤。正因如此，话语谱系学认为，对政策演进过程的剖析必须遵循历时性视角，方能把握其过程全貌。

第二，在微观上，突出政策话语的叙事本质，主张以“二维化”的文本分析检视政策过程。话语谱系学认为，政策的本质是由反映决策者主观认知偏好的一系列“话语族群”（discourse clusters）所构成，依据不同话语族群在政策叙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分为“结构性话语族群”和“功能性话语族群”^⑥。结构性话语族群是具有连贯性和独立叙事逻辑的一个话语实体，主要服务于政策叙事语境的构建，为决策者描绘政策背景、框定政策范畴、阐释政策动机提供统一的纲领。功能性话语

① 岳圣淞 《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

② Nick Hardy, “Foucault, Genealogy, Emergence: Re-Examining the Extra-Discursiv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 41, No. 1, 2011, pp. 68-91.

③ Yotam Gidron, “From Discursive Resistance to New Genealogies: Rethinking Israelite Identities in Africa through the Case of Nuer Christian Zionists”, *Africa*, Vol. 91, No. 5, 2021, pp. 832-851.

④ Barry M. Franklin, “The Discursive Roots of Community: A Genealogy of the Curriculum”, *Counterpoints*, Vol. 491, No. 1, 2016, pp. 53-65.

⑤ Stephen Szilagy, “The Primacy of Pope’s ‘Ode on Solitude’ in a Genealogy of His Discursive Sel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ubbock)*, Vol. 38, No. 1, 1997, pp. 63-78.

⑥ Dimple Godwala, “Hybridised Identity as Counter-Discursive Strategy: A Genealogy of British-Asian Culture and Its Postcolonial Theatres”, *South Asian Popular Culture*, Vol. 1, No. 1, 2003, pp. 33-44.

族群则涵盖了政策的不同领域，常见的功能性话语族群包括经贸话语、安全话语、政治话语、社会话语、文化话语和历史话语等。功能性话语族群具有明显的亲缘性特征，即遵循相同的对外政策理念、秉持相同的价值判断体系，但在内涵和功能表达上存在异质性，且能够根据外部政策情势的演进进行一定程度的进化，以确保能够始终完整和充分地反映决策者动态变化的决策意志^①。在此基础上，话语谱系学将政策文本进行了“二维化”处理，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同步构建分析框架^②。纵向代表“时间维度”，通过将特定政策置于连贯的、由不同阶段组成的时间坐标轴上进行分析，以动态检视其话语结构、话语内容和话语量级的变化；横向代表“谱系维度”，通过将从属于同一政策话语范畴内的不同话语族群的平行排列，结合对时间维度的参照，观察不同阶段话语族群的排列顺序差异，剖析其产生的原因。

第三，在具体的分析实践中，强调基于政策话语“代际传播”的谱系特征，结合政策叙事学的分析工具，揭示政策话语如何在权力作用的影响下进行调整和变化，进而全面重现政策演进过程背后的权力网络图谱^③。对不同阶段话语结构、话语量级和话语内容的变化，以及对不同话语族群的排布差异和其实现方式进行分析，致力于发掘不同阶段政策话语体系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为政策趋向变化现象提供动态的解释^④。

三 “化敌为友”：美国对越政策叙事的演进

（一）美国对越政策话语谱系概述：叙事要件的组成及时间线划分

通过梳理美越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官方公开的相关政策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对外政策文件、国会年度国别分析报告以及历任美国总统的公开演讲等）内容，本研究将美国对越政策的叙事要件归纳为两部分：一是由情境话语和身份话语构成的结构性话语族群，二是由历史话语、价值观话语、经贸及务实合作话语、安全话语和区域治理话语构成的功能性话语族群。

在时间线划分上，本研究充分考虑了美国政府任期、美国的亚太政策演进和对越政策演进三个时间线索相互交织、密切相关的现实，将美国对越政策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并以美国政府任期和美国亚太政策调整的关键节点作为同步参考系^⑤

^① Derek Hook, “Discourse, Knowledge, Materiality, History: Foucaul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 Psychology*, Vol. 11, No. 4, 2001, pp. 521-547.

^② Seong Min-Kyu, “Not Yet Post-Cold War Era: A Genealogical Search for the Cold War Discursive Infrastructure in Counter-Jongbuk Surveillance Politics”, *Korea Journal*, Vol. 58, No. 4, 2018, pp. 5-32.

^③ Vito De Lucia, “Competing Narratives and Complex Genealogies: The Ecosystem Approach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 27, No. 1, 2015, pp. 91-117.

^④ Kelley M. King et al., “Frame Genealogy as an Approach to Tracing Ideology in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Methodologies*, Vol. 22, No. 3, 2022, pp. 290-301.

^⑤ 本文案例分析部分主要关注 21 世纪以来美国对越政策的演进过程。由于分析起始点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为确保分析政策的连贯性，故而将时间线向前推至美越两国正式建交的 1995 年。特此说明。

(见图 1)。



图 1 美国对越政策演进的时间线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重心开始转移，老布什政府将对外政策关注点由欧洲投向亚洲，并在对越关系方面制定了美越关系改善的“四阶段行动路线图”，使美越关系解冻正式被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轨道，也为克林顿政府的对越政策叙事奠定了政策语境基础^①。

(二)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越政策叙事与美越关系正常化

克林顿政府的对越政策建立在其亚太战略框架之上，其亚太战略是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降低了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提升了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克林顿上台后，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并把亚太提升至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地位，全方位、高强度地参与亚太事务，以谋求建立以美国主导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军事安全集体化三根支柱为支撑的亚太新战略，从而既保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又保证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主导地位，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维持美国“唯一霸权”的地位^②。

身份话语的重塑是克林顿政府推动美越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克林顿政府的目标是要让美国国内各界接受并认可越南是一个“正常国家”^③。在此之前，由于始终无法摆脱“越战综合征”的思维定势，美国政界、军界、战略界和学界对越南政

^① He Kai “The Hegemon’s Choice between Power and Security: Explaining US Policy toward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4, 2010, pp. 1121-1143.

^② 马士平 《是和解，还是战略互动？——剖析越战 25 年后克林顿的访越之行》，《东南亚纵横》2001 年第 2 期。

^③ Euan Grham “Southeast Asia in the US Rebalance: Perceptions from a Divided Reg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5, No. 2, 2013, pp. 305-332.

策讳莫如深,导致越南长期被排除在美国亚太政策框架之外。克林顿政府选择打破美越之间“敌—我”身份的二元划分,并明确提出“对于美国而言,越南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场战争”的观点^①,力图将美越关系的政策语境与越南战争的历史记忆一定程度地剥离,将美国对越政策的叙事起点建立在“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共有身份之上。克林顿政府的表态得到越南的积极回应,为美越关系正常化破除了关键的认知障碍。

在功能性话语族群的分布排列方面,克林顿政府的对越政策叙事主要包含历史话语、价值观话语、经贸及务实合作话语和安全话语四个话语群,这四个话语群的分布有明显的优先顺序和量级大小的区分。其中,历史话语和价值观话语占据主导且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具有最高优先级。这意味着,克林顿政府将缓解价值观对抗并妥善解决由此产生的历史问题作为改善美越关系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后,美国对越政策的议程范围才能进一步拓展^②。

在历史话语中,克林顿政府继续将“越战善后事宜”作为叙事核心,指出美越应在搜寻美军失踪人员、释放战俘问题上加强合作,并强调上述问题的解决关乎美越关系正常化和越南能否融入国际社会^③。在价值观话语中,克林顿政府将人权、言论和宗教自由、政治体制作为核心议题,并不断以威胁和警告的口吻强调,上述问题如不得到改善,美越双边关系就无法走向成熟^④。在美越建交初期,克林顿政府将历史问题和价值观问题相互糅合,不断向越南施压,以展现对越强硬姿态,争取为美越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基调并争取主动权^⑤。

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在美国对越政策叙事中出现较晚且程度较弱。随着美越关系的解冻,美国商界对投资东南亚,特别是投资越南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彼时,部分欧洲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深耕越南市场,美国企业不愿错失重大商机,故开始向克林顿政府施压^⑥。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对越经贸及其他领域务实合作的政策框架,在相关的政策话语中,克林顿政府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商界对美越贸易合作的观点,并将其与历史问题和价值观问题间的关系进行了合理性论证,认为美越历史和价值观矛盾不应成为阻碍美越经贸关系正常化的

①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at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in Hanoi, Vietna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November 17, 2000,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vietnam-national-university-hanoi-vietnam>

② 吴心伯 《论克林顿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on Lifting the Trade Embargo on Vietnam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3, 199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lifting-the-trade-embargo-vietnam-and-exchange-with-reporters>

④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at a Memorial Day Ceremony at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May 31, 199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memorial-day-ceremony-the-vietnam-veterans-memorial>

⑤ 金君晖 《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思想初析》,《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

⑥ Evelyn Goh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Strategy”,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2004, pp. 47-69.

症结,反而应成为促进美越经贸及务实合作开展的动力^①。在批准对越豁免《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ck Amendment)^②并最终宣布解除对越贸易禁运的过程中,克林顿本人及其内阁成员始终强调恢复美越正常贸易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经贸关系的加深将为越南经济水平的提升带来重大机遇,也将促进美越战争历史问题的解决;并且,经贸合作还将推动越南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更契合美国希望促进越南实现“自由化”目标的意图^③。

安全问题是美越关系正常化初期最为敏感的政策议题。克林顿政府在对越政策的安全话语建构中选择了相对谨慎和保守的策略,避免美越关系势头因战争问题而被扭转^④。但同时,克林顿及其内阁普遍认同越南在东南亚独特的区位优势,不愿放弃越南的地缘战略价值^⑤。基于此,在安全话语中,克林顿政府选择了“双线叙事”的手段,一方面直面阐述美国东南亚政策及越南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毫不讳言地将金兰湾视为补全其地缘战略短板的重要资源;但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仍选择将美越直接军事接触的议题限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有限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照顾到美国国内反对派和越南方面的情绪^⑥。

总体来看,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越关系尚处于破冰恢复阶段,除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外,政治、经贸、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依旧有限^⑦。为了建立有利于美越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框架,克林顿政府在相关政策叙事中选择了历史、价值观、经贸和安全四大话语作为其叙事逻辑的主轴,并作出鲜明的优先级排列,通过政策文本相互印证的方式对各部分的话语资源分配进行灵活分配,最终形成一种“双向因果”的环状叙事体系。这种叙事策略的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当时美国对越政策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即高度强化对价值观和历史问题的关注,为美越关系发展设置高门槛、掌握主动权,同时又适当兼顾美国对越南现实的政策需求,即开展贸易往来,推动安全接触。但由于各部分政策叙事相互掣肘,使之难以在任何单一领域实现突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实践的效能。

(三) 小布什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越政策叙事与美越全面伙伴关系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周期。但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整体向支持其全球反恐行动转移。在此背景下,

^① “Clinton Ends Vietnam Trade Embargo”, Politico, February 3, 1994,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2/clinton-ends-vietnam-trade-embargo-feb-3-1994-234390>

^②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贸易改革法案》所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禁止美国向苏联、东欧等限制移民出境的国家提供贸易方面的优惠,该法案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贸易政策的核心。1998年,克林顿政府宣布正式取消该法案对美越贸易的限制,美越经贸关系因此得以改善。

^③ China Business Information Network, “China: US House Backs Clinton on Easing Trade with Vietnam”, *New York: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1999, p. 1.

^④ 许嘉 《美国新政府亚太安全战略趋势》,《国际观察》2001年第3期。

^⑤ Brian J. Snee, “Clinton and Vietnam: A Case for Amnestic Rhetoric”,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49, No. 2, 2001, pp. 189-202.

^⑥ 于向东 《越南与大国关系的若干动向》,《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

^⑦ Erwin C. Hargrove, “An American Quarter Century: US Politics from Vietnam to Clint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3, No. 2, 1996, p. 710.

小布什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美国对越政策和美越关系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①。小布什政府继承了克林顿政府对越政策叙事的几大要素,并在推进全球反恐行动的背景下赋予越南“亚太反恐合作伙伴”的全新身份定位^②。与之相匹配,美国的对越政策叙事明显提升了安全话语的建构水平,并开始突出强调越南的战略价值,试图以此方式将东南亚地区打造成为协同其全球反恐行动的“第二战场”。在此基础上,经贸与务实合作被提上日程,美越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水平相较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有了显著提升。同时,历史话语和价值观话语得到很大程度的延续,但叙事方式、叙事体量以及话语烈度均有所减弱。

安全话语无疑成为小布什政府时期对越政策叙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方位推动“全球反恐”行动的背景下,小布什政府在官方话语中不断强调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反恐前沿地带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并直白地表露出欲将其打造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反恐的“战略支点”和“独立力量中心”的意图^③。相较于美国对越政策在安全领域热度的持续上升,越南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回应。但同时,作为战略回报,越南也提出希望能够在经贸和务实合作领域同美国加深互动,特别是希望小布什政府能够支持其“入世”申请^④。为此,小布什政府开始谋划对越经贸合作的新框架,探索如何在有限的政策限度内满足越南的需求。在这一时期的对越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中,美国官方将“支持越南入世,以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作为主题,强调越南作为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巨大潜力,及其在平衡中国经济影响力方面的战略价值^⑤。通过长期系统的政策话语铺垫,小布什政府得以最终为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扫除国内政策障碍、实现美越贸易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相较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美越务实合作领域还有了一定拓展,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两国在民航、卫星通信以及民用核设施方面签订的一系列协定^⑥。客观来说,上述合作的推进同美国官方政策话语中持续凸显越南对美战略价值并一定程度对美越历史问题和价值观矛盾予以淡化,进而将越南对美身份进行“去安全化”建构的策略不无关系。

在历史话语和价值观话语建构方面,尽管美国出于现实政策需求的考量对这两大议题下的政策内容进行了淡化,但并不意味着相关矛盾和争议的消失^⑦。相反,

① Satu P. Limaye, “Minding the Gap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U. S.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1, 2004, pp. 73-93.

② Brendan Tayl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Asia Pacific Multilateralism: Unrequited Lo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1, 2008, pp. 1-15.

③ Christopher T. Jespersen, “Analogies at War: Vietna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War in Iraq, and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3, 2005, pp. 411-426.

④ Robert Sut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6: Crisis Management, Holding Patterns, and Secondary Initiatives”, *Asian Survey*, Vol. 47, No. 1, 2007, pp. 10-21.

⑤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Trip to Southeast Asia”, White House Archives, November 17, 2006,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asia/2006/>

⑥ 周琪、齐皓 《从反恐战争到“太平洋总统”——近十年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内在驱动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

⑦ Evans J. R. Reve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DIS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Management*, Vol. 27, No. 4, 2005, p. 65.

无论是在安全合作，还是经贸合作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美国内始终存在反对现政府推进美越关系升级的声音，而这些异见提出的核心依据，始终是围绕美越之间的战争问题和价值观矛盾展开。与此同时，小布什政府也意识到，由于两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距，加之越战的历史记忆对美国民众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一味坚持推进美越关系改善而不顾国内的负面话语压力，不仅无法顺利实现其政策目标，反而还有可能令来之不易的双边关系改善势头被扭转。更重要的是，小布什政府一直担心加强与越南的战略关系与美国一直奉行的只与该地区“民主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传统理念相违背，更担心此举可能会增加越南陷入“独裁统治”的风险^①。因此，为了缓解美国国内反对派对现政府改善美越关系所施加的政策压力，小布什政府决定，在加强与越南双边关系的过程中，必须不时在人权以及宗教自由等问题上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推动越南国内政治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以此向外界证明美越加强伙伴关系并没有与美国对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发生冲突^②。基于这一考量，小布什政府在塑造历史话语和价值观话语的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灵活的策略，一方面，抓住宗教和人权等问题持续对越施压，但并不过多触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等深层次价值观矛盾；另一方面，将战争历史问题的解决与安全话语进行切割，避免安全合作因历史问题的掣肘而难于推进^③。

总体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越政策叙事相较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更具有务实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理念的回归^④。这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议题和内容选择上。可以看出，克林顿政府强调的历史和价值观话语不再被当作优先议题，而是被作为安全话语和经贸话语的工具支撑和行动依据——这一趋势在美国对越经贸话语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为了实现美越贸易关系正常化、赋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美国采取了类似于对华政策中的“贸易—人权”问题“挂钩”政策，将贸易问题价值观化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转移复制；涉及理念层面因素的话语族群被人为压制，具有务实主义特征的话语占据主导，在内容上体现出更强的“结果导向性”；环状叙事的结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单向的因果叙事逻辑。通过上述一系列话语策略的实施，小布什政府得以在“全球反恐”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式进一步改善了美越关系，为美越关系的未来演进奠定了基础，这一趋势也延续至奥巴马政府首任任期期间。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亚太区域政策展开了新一轮调整，明确提出“重返亚太”口号，并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逐渐上升的区域影响力。在此背景下，越南的战略价值被再度提升，被美国视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① “Bush, Vietnam President Hold Historic Meeting”, NPR, June 22, 2007, <https://www.npr.org/2007/06/22/11278174/bush-vietnam-president-hold-historic-meeting>

② 翟崑、原瑞辰《美国在东南亚的领导困境探析（1991—2021）》，《东亚评论》2021年第2期。

③ T. J. Pempel “How Bush Bungled Asia: Militarism, Economic Indifference and Unilateralism Have Weakened the United States across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21, No. 5, 2008, pp. 547-581.

④ Jennifer Mustapha “Threat Construction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ost-9/11 Foreign Policy: Critic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24, No. 4, 2011, pp. 487-504.

“重要支柱”^①。为进一步塑造美越关系大方向，促进美越合作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奥巴马政府更新了对越政策的叙事策略，在总体延续前任政府“强调安全与合作、适度淡化历史和价值观等敏感问题”的叙事结构和话语基调的基础上，对各部分话语族群的具体内容和议程设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是在结构性话语族群方面，为凸显“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政策新意和重要性，奥巴马本人及其内阁高层在表态和演讲中不断提及亚太地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并强调美国的“亚太国家”身份，以及东南亚国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②。在这一宏观政策语境的框定下，美国对越南的身份话语进行重构，不仅强化了美越共有身份的认知，还赋予越南更加具体和丰富的多重国际身份：在美越关系的双边范畴下，越南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在东南亚地区层面，越南是美国的“战略支点”和“独立力量极”；在多边机制合作框架中，美国支持越南在东盟和澜湄合作框架下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国家”，认为越南是“东南亚未来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之一”；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被美国界定为“在南海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国家”以及“同美国一道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利益攸关方”^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越南上述多重身份的建构并不是以独立的身份话语建构实现的，而是采取了“话语嵌套”的方式将其分散地嵌入美国对越政策的各个话语族群之中，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环环相扣、彼此关联的叠加身份话语形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与前几任政府对越政策叙事单纯依赖话语的因果逻辑本身驱动叙事演进的基本思路不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越政策叙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身份话语”实现连接的，对越南身份的塑造贯穿了这一时期美国对越政策叙事的始终；各种具体的身份相互交织，最终促成“美越全面伙伴关系”这一共有身份的确立^④。

其次是在功能性话语族群方面，奥巴马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叙事结构，将安全话语、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置于优先位置，价值观和历史话语次之，并在话语体量和叙事强度上凸显出“重合作、轻理念”的“结果导向型”的政策话语建构思路。在安全话语中，为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形成呼应，奥巴马政府将“南海问题”作为对越政策安全话语的核心议题，将中越南海争端包装成为“中国军事化行动严重干扰南海秩序”背景下“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安全事件”^⑤，并由此构建起美越安全合作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论据。在此基础上，美

① Douglas Pa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11: Obama Determined to Bring America ‘Back’ to Asia”, *Asian Survey*, Vol. 52, No. 1, 2012, pp. 6-14.

② Hunter Marston “Examining the US Rebalance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Obama”,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1, 2017, pp. 47-58.

③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y 24,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5/24/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people-vietnam>

④ 李益波 《浅析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外交》，《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于向东、宋晓森 《越美关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

⑤ “Obama Raises Human Rights in Vietnam, Calls for ‘Peaceful Resolution’ of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CNN Politics, May 24, 2016, <https://edition.cnn.com/2016/05/24/politics/obama-vietnam-south-china-sea/index.html>

国进一步扩展美越安全合作的内容, 派生出“美越防务合作常态化”、“美越防务政策沟通机制化”和“美国对越军事援助系统化”三个子议题, 进一步提升了美越安全合作的水平与效率^①。在此过程中, 涉及战争历史问题的政策行动规划被一并纳入“美国对越军事援助”的范畴内, 并被界定为“值得双方持续关注, 但不应影响美越安全合作大局的历史问题”。由此可以看出, 为提升越南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践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与前任政府类似的方式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 试图通过“去安全化”和“军事问题民间化”的方式降低其敏感性和对抗性^②。

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同样是奥巴马政府对越政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 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持续上升的影响力对美构成的潜在威胁”^③, 经济体量不断扩张、经济发展势头稳定的越南被美国视为重点扶持对象, 美国意欲通过加强美越经贸联系产生的地区辐射效应, 进一步扩展其在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④。基于这一政策思路, 美国对越经贸政策话语将“支持越南加入 TPP”、“推进美越双边投资协定 (BIT)”及“提供发展援助和拓展高新技术领域合作”作为三个主要议题展开论述^⑤。对比小布什政府时期同类话语族群的内容可以发现, 奥巴马政府对越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明显体现出更强的机制化和战略性特征, 具体政策行动不再是权宜性和阶段性的举措, 而更注重考虑两国关系发展超越双边层面可能产生的“地区性示范效应”, 希望通过美国对越政策话语展现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一种可供参考和符合其预期的合作样板, 以进一步提升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影响力^⑥。

相比之下, 奥巴马政府对越政策中的价值观话语则更显得“老调重弹”, “缺乏新意”, 政策话语始终聚焦人权、宗教和言论自由等议题展开。同美国历届政府一样, 奥巴马政府也不时对越南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 并多次公开谴责。2011 年 11 月在夏威夷宣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时,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强调“我们已多次向越南政府表示, 如果美越关系如双方所希望的那样向战略伙伴关系的方

① 王楠、王甄 《美越军售前景预测分析》, 《现代军事》2016 年第 7 期。

② 李家成、蒋欣桐 《越南加入 TPP 的美国因素解析》, 《战略决策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③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Commemoration Ceremony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etnam War”,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y 28,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5/28/remarks-president-commemoration-ceremony-50th-anniversary-vietnam-war>

④ David Kieran “‘Never Too Late to Do the Right Thing’: Barack Obama, the Vietnam War’s Legac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ilitary Awards during the Afghanistan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51, No. 2, 2017, pp. 513-533.

⑤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President Truong Tan Sang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ly 25,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7/25/joint-statement-president-barack-obama-united-states-america-and-preside>

⑥ 鞠海龙 《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 《当代亚太》2011 年第 3 期。

向发展,越南必须要在尊重以及保护其民众权利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① 2012年7月,希拉里再次出访越南时表示,美国支持河内为解决南海争端所做的努力,并强调美国希望越南在人权保护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她对越南“继续拘留”记者、博客博主、律师以及异见分子表示不满,还对越南国内网络言论受限“尤为担忧”。希拉里表示,“越南正处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伟大国家的道路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越南政府逮捕进行和平抗议的民众、镇压宗教团体以及对网络自由进行限制担忧的原因。”^②

总体来看,相较于克林顿政府时期高度强调历史与价值观问题的叙事策略不同,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越政策叙事更加凸显了美国外交政策一贯的务实主义色彩,将安全合作以及经贸与务实合作视为美越关系发展的优先方向,对价值观和历史问题采取了搁置争议、淡化敏感度和对抗性的处理方式,对其同美越务实合作的具体政策进行切割,避免影响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在叙事风格上,两届政府均采取了稳健和积极的话语基调,注重在地区和多边机制合作的语境下不断扩充和丰富对越身份的具体内涵。通过这一系列的话语建构策略的不断推进,美国得以不断实现提升美越关系水平的阶段性目标,并最终促成美越关系“化敌为友”,从正常化到“全面伙伴关系”的升级。

(四) 特朗普与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越政策叙事与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特朗普政府任内的对外战略趋向及其实践方式始终饱受争议。从政策叙事的角度来看,其对外政策叙事的建构方式与以往历任政府形成了强烈反差,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外界对美国官方政策话语的既有认知。特朗普政府对越政策叙事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以结果导向取代过程导向,主张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全面重构对越政策框架,以“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为对外政策宗旨,遵循经贸、安全、价值观和历史问题的顺序对政策议程优先级进行了重新排列^③。

在经贸话语中,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正反叙事”对比的方式,一方面,肯定越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地区经济秩序和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明确表示将加强美越经贸联系、支持越南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④;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强调在“捍卫美国国家安全”背景下改善国家经贸交往环境、打破当前所谓“不公正、不合理的经贸秩序与规则体系”的决心,并对美越间贸易的不平衡性表示关切,对越南在同美国开展经贸往来过程中采取的“贸易失范”行为予以批评,敦促越方在改善美越贸易赤字现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改善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Diplomacy in Action, November 10, 2011,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1/176999.htm>

^②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to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U. S. Department of State-Diplomacy in Action, July 12, 2012,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7/194987.htm>

^③ Joseph M. Siracusa and Hang Thi Thuy Nguyen, “U. S. -Vietnam Relations in the Trump Era”, *Asian Affairs (London)*, Vol. 50, No. 4, 2019, pp. 602-611.

^④ Ja Ian Chong, “Deconstructing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Trum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9, No. 1, 2017, pp. 29-35.

美企在越营商环境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①。但总体上，相较于同一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话语，对越相关政策的基调明显更为积极。

在安全话语中，为配合“印太战略”的推进，特朗普政府选择将对越安全合作的政策背景设置在印太的宏观地缘语境中，并以强烈的“安全化”思维方式展开建构。首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以所谓的“南海安全秩序遭遇挑战”和“中国威胁论”为基础提升对美越关系外部环境的威胁感知^②。其次，从双边到多边，分层次、分领域地论证扩展美越安全合作范围、提升双边合作层次的必要性。在双边层面，美国选择继续以“南海问题”为突破口，公开支持越南对南海权益的声索，同时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诉求^③，将美越安全合作与越南安全利益相链接，以提升越南的积极性和政策参与度。在多边层面，提出在以东盟、澜湄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框架下支持越南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同美国一道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而采取一致性行动^④。在具体的合作事项中，安全政策、人员互访、军事援助、军事教育与训练、越战失踪人员搜寻等议题均被纳入双边合作框架，部分合作还以协定等具有约束力的形式得以固定，合作范围与水平较前任政府时期均有了显著提升^⑤。

相较于对经贸与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特朗普政府在价值观问题上并未对越南过度施压。尽管“印太战略”的相关政策文件始终强调战略的实施根本上是为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受威胁”，但这种渲染价值观对抗的话语具有更加明显的指涉目标。作为同中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高度趋同的国家，越南对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的政策趋向尤为关注，也对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对越南实施“和平演变”的动机高度警惕。在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越南被美国视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⑥。为避免激化价值观矛盾，影响美越合作，美国在相关话语的处理上很大程度延续了前任政府谨慎而保守的话语基调，除了常态化地申明美国对越南在“人权、宗教、言论与结社自由等方面的关切”外，特朗普本人及其内阁成员还在涉及经贸领域的双边问题处理上加入价值观因素，如特朗普就曾公开对越南经济的“非市场化”运作模式提出批评，并将越南

① Walter Lohm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9, No. 1, 2017, pp. 36-41.

② Luu Van Quyet et al., “U. S. -Vietnam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the Current Biden Administration”,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Vol. 10, No. 1, 2023, pp. 22-37.

③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Quang of Vietnam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Archives, November 11,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ident-quang-vietnam-joint-press-conference-hanoi-vietnam/>

④ 贺先青 《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话语、行为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⑤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Meet-and-Greet with Vietnam War Veterans”, The White House Archives, November 10,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eet-greet-vietnam-war-veterans/>

⑥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Da Nang,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Archives, November 10,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列为“汇率操纵国”^①。但上述言论仅停留在官方表述的话语层面，美国并未采取类似于对华政策的相关手段对越南展开战略打压，因此其对美越关系的负面影响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内。

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对外政策领域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趋向和实践手段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但在推进“印太战略”的理念和政策目标上却继承和深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这一趋势在对越政策方面也体现得较为明显^②。在叙事内容的选择上，拜登政府依旧延续了以经贸与务实合作、安全合作为先导，但对其他领域的议题设置进行了重构，依据不同议题下具体事项的性质，结合美越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将价值观和历史问题进行拆分，最终形成了以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安全合作话语、科技合作话语、政治外交合作话语、社会人文合作话语为核心的五大全新的话语族群，以凸显美越关系发展的全面性和务实性特征^③。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官方话语对越南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也将越南明确列为“印太战略”推进过程中美国致力于强化提升的多对伙伴关系之一，但由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推进。而越南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和社会问题频发，始终无法给予美越关系提升充分的战略关注，因此双边关系并无实质性提升。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开始进入全新的政策周期。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博弈的持续深化，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资源投入不断加大，试图通过双多边结合、多领域、全方位的机制建设增强对华遏制力度。在美国选定的“东南亚地区支点国家”中，越南在资源水平、发展潜力、实力地位、政策亲美度和区域影响力等多个方面均被视为“美国可以加强合作以进一步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理想选择^④。

基于这一考量，拜登政府上任初期就着手布局美越关系提升的具体举措。在对越叙事中，这种趋向更为直观地体现在对越身份定位的相关表述中。从驻越大使、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各个高层的表态可以看出，美国政府频繁地使用“战略合作伙伴”作为新时期美越关系的标签，持续为美越关系提升预热。2023年9月，拜登在访问越南期间正式宣布，美越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在美越两国伙伴关系的序列中均处于最高层级。在《联合声明》中，美国对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进行了系统性阐释，进一步充实了对越政策叙事中各个话语族群的内容。通过文本分析，并对比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新版《美国印太战略》中有关对越政策的表述发现，其对越政策叙事呈现出一定的新特点。

① “US Declares Switzerland and Vietnam Currency Manipulators”,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6,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9bed4d84-fdec-4f03-9560-dc58f2721899>

② 袁莎 《特朗普执政下美越关系的新态势与新挑战》，《中国—东盟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蔡祖丞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实施及其反响》，《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5期。

④ Joseph R. Biden Jr.,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Annual U. S. -ASEAN Summit”, U. S. Embassy & Consulate in Vietnam, November 17, 2022, <https://vn.usembassy.gov/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annual-u-s-asean-summit/>

第一，在务实合作领域更加注重实效且范围不断延伸，力图将美越合作范围覆盖至美国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以凸显美越伙伴关系“全面”的特质，在各个话语族群中又派生出新的“子话语”，以动态反映美越合作范式的灵活度不断提升、利益融合度不断加强的现实^①。在“制衡中国、重构印太秩序”的宏观政策语境下，原本的经贸话语被进一步细分为市场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等多个子议题，体现了美国对越南经济发展水平的认可，以及对美越经贸关系的重视。务实合作话语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包含能源、气候、环保、基础设施、制造业、医疗卫生、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②。安全合作力度不断提升，除了承袭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的美越常规军事合作议程，如两国在军备、人员、援助、政策以及越战善后事宜等领域的沟通交流外，拜登政府还特别强调美越将在“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秩序”和“加强海上防务合作”两个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体现出其支持越南成为东南亚国家中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展开持续施压和战略周旋的“代理人”意图^③。

与此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领域合作被单独列出，成为一个全新的话语族群，其中，美国为美越在信息技术范畴下的多个领域合作规划出一条具备“全生命周期”的合作框架，从资源投放、技术供给、人才培养到成果实践，均设定了明确的时限，并通过一系列协议实现制度化^④。这不仅反映出美国意欲将越南纳入其致力于构建的“更具韧性与活力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意图^⑤，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越南试图通过加强美越高新技术合作来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诉求^⑥。

第二，拓展相关话语适用范围，使双边和多边手段的协同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以凸显美越伙伴关系“战略”的特质。以机制化的提升推动“印太战略”实践效果的提升是拜登政府区域政策的核心思路之一。基于此，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就始终致力于推动印太地区政治、安全、经济多边框架的完善和构建。作为印太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将越南视为其主导的多边制度框架下的重要参与者，

① 施雪琴、郑青青《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Joseph R. Biden Jr.,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Vo Van Thuong of Vietnam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Hanoi,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9/11/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vo-van-thuong-of-vietnam-before-bilateral-meeting-hanoi-vietnam/>

③ Ann Marie Murphy et al., “Can America Come Back? Prospects for U. S.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sia Policy*, Vol. 16, No. 4, 2021, pp. 65-67.

④ 李巍、王丽《拜登政府“供应链任性”战略探析》，《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

⑤ Joseph R. Biden Jr.,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General Secretary Nguyen Phu Tro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in Joint Press Statement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9/10/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general-secretary-nguyen-phu-trong-of-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in-joint-press-statements/>

⑥ Robert Repetta “Regaining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 *Challenge*, Vol. 66, No. 1-2, 2023, pp. 23-26.

尤其支持越南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发挥建设性作用^①。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希望越南能够在区域多边机制中发挥“协调员”的作用,并以自身在美越合作中获得的切实收益为例,在地区经济、安全秩序以及区域发展理念方面引导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共同支持美国发起、主导或积极参与的合作倡议与框架^②。

第三,对长期困扰美越两国关系发展的价值观和历史问题重新定性、拆分与整合,依据具体事项议程的特性将其进行“功能化”和“去安全化”处理,以降低敏感性,避免对美越关系构成负面影响。针对价值观问题,拜登政府在对越政策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话语族群,即“政治外交合作话语”。在这一话语族群中,除了涉及两国各层级的官方交流、政府与政党间对话等常规内容外,还提出如基本人权、劳工权益、性别平等、宗教自由、弱势群体社会权益保障等内容,强调美越双方将在“充分尊重彼此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就上述问题“展开对话交流,加强理解,减少分歧。”^③在涉及越战善后事宜的问题上,拜登政府选择将部分与军事合作直接相关的事项,如继续搜寻越战失踪美方人员、清除越战遗留战争设施等纳入安全合作话语范畴,同时将橙剂清理、对越战争赔偿等问题纳入社会与人文合作话语之中。通过实施上述话语策略,拜登政府得以妥善处理阻碍美越关系提升的一系列敏感问题,并最终实现美越关系的大幅升级^④。

结 语

本文从话语谱系学的视角出发,对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越政策叙事进行分析发现,自克林顿政府时期起,美国对越政策叙事始终遵循着一条较为明晰的身份线索,即从最初赋予越南以“正常国家”的独立身份,到美越之间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的共有身份;从“反恐合作伙伴”到“全面合作伙伴”;从“亚太国家”“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支点”,再到“印太伙伴”直至最终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在这条身份线索的推动下,尽管历经五届政府更迭,美国对越政策叙事始终保持总体稳定且积极的基调。与此同时,为了在美越关系中持续保持灵活性和主动权,美国历任政府在对越政策叙事总体架构、议题和内容选择、话语量级与频率、话语风格及策略等方面呈现出更为多元的表达,并通过“(去)意识形态化”“(去)安全化”“挂钩与脱钩”“历史互文”等话语手段的协同,确保美国的决策意志和战略意图始终能够在对越政策叙事中被及时充分地呈现。

从话语谱系学的角度来看,安全话语、经贸与务实合作话语、价值观话语和历

① Joseph R. Biden Jr., “Remarks at a State Luncheon With President Vo Van Thuong of Vietnam in Hanoi, Vietna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state-luncheon-with-president-vo-van-thuong-vietnam-hanoi-vietnam>

② 徐金金、严俊诚《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越全面伙伴关系:新进展、动因及前景》,《东南亚纵横》2023年第1期。

③ Khang Vu, “Overcoming Differences,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Next Step for the US-Vietnam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plomat*, Vol. 23, No. 4, 2023, pp. 234-239.

④ 吴夷麟、张跃耀《越南大战略:对过去五年的回顾》,《南洋资料译丛》2023年第2期。

史话语被长期作为美国对越政策叙事的核心话语族群，但不同政府时期对各个话语族群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在话语谱系学看来，理想的政策过程呈现出的从结构到内容、从物质因素到理念因素的各部分话语族群应相对均衡，且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交叠形成贯通的叙事图谱，而美国对越政策叙事呈现出的却是一种“畸形派生”的图谱，即明显过度扶持特定话语族群的演化，同时又人为压制其他话语族群的生存空间，不同话语族群之间存在明显区隔，缺乏必要的政策沟通。在此背景下，美国主观降低了对越认知中“价值观风险”的量级，并通过对双边务实合作的功能性强化，试图掩盖对越叙事中存在的逻辑缺陷，以维护美越关系在宏观叙事上的平衡。

总体来看，自 1995 年美越关系正常化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政策互动，美越关系基本实现了“化敌为友”的重大转变。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越关系加速推进，并在拜登政府时期实现了从“全面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式提升。但也应看到，由于两国在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还曾经历 20 余年“兵戎相见”的对峙，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冲突的裹挟令美越关系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而形式上的和解，更多的只是双方通过利益交换实现战略平衡的一种折中、权宜和妥协的“表象”。随着中美博弈态势深化、亚太地区权力格局调整、中美越三国在域内的战略互动影响交叠外溢，美越关系所经历的政策语境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与越南国内政治的持续动荡也势必将为双边关系的走向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对越政策叙事的总体基调虽不会在短时间内逆转，但话语实践中的议程、风格、策略和手段都将经历新一轮的调整。特别是在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持续泛滥的背景下，为继续在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美国对越政策叙事一方面将更加凸显“胁迫性”和“威慑力”，通过增强对所谓“中美对峙”前景的“悲观预期”以及对东西方意识形态矛盾的周期性渲染，激发越南的“危机意识”，以防范越南未来在中美间可能采取的战略投机行为、单边降低对美“非对称依赖”并最终导致美越关系的疏离；另一方面，将同时呈现更为明显的“议价性”和“协商性”特征，美国对双边经贸、安全、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的“可信性承诺”将被作为对越关系发展的前景叙事基础，以增强越南对双边关系发展的信心、塑造其对美越合作形成所谓“良性预期”。

【责任编辑：孙斐娟】

Abstract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US Policy Narrative Towards Vietnam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ursive Genealogy

YUE Shengsong

【Abstract】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onceptual change of the American decision-makers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and its behavior logic can be fully reflected through the policy narrative discourse.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scursive genealogy, this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atlas” of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and thus provides a consistent explanatory logic for the upgrading of US-Vietnam relation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Vietnam relations, the U.S. official discourse has been continually sought to redefine the essence of Vietnam’s national identity,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US government’s policy adjustment. During this process, sever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such as the adjustments of discursive magnitude and frequency, the choices of topics and contents, as well a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policy architecture, have been adopted to ensure that the US’s decision-makers’ strategic intentions can always be reflected in the practice of policy in a timely manner.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based on rationalist paradigms and materialism perspectiv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US-Vietnam relations from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decision-makers and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 path may provide an enlightening perspective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and evolution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Vietnam relations.

【Keywords】U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US-Vietnam Relations; Discursive Genealogy; Strategic Narrativ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uthor】YUE Shengso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the Joko Widodo’s Administration in Indonesia

PAN Yue

【Abstract】During President Joko Widodo’s ten-year tenure, Indonesia has provided a unique model for the modernization path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thoroughly analyzing the prin-